

双重身份与中国的机遇期

李少军

国际体系作为行为体的互动所形成的整体结构，是中国实施对外政策的环境与舞台。在国际体系中，身份是决定中国的利益、立场和实现利益之途径的一个基本因素。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当今正日益被视为一个“大国”。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参与国际互动有迥异的机制与结果，因此中国面对着双重身份的困境。要破解这一困境，中国一方面需要从主观上认清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不同互动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恰当解决客观上两种机制并存所带来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中国需要应对国际体系所内含的权力政治、国际制度与观念建构等主要影响机制，适宜地开展实力外交、制度外交和公共外交。中国只有利用体系的系统效应，趋利避害，处理好实力的发展与运用以及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中国身份 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 双重身份 战略机遇期

机遇期是指蕴含机会的发展时段。对这样的前景进行评估和判断，要根据行为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因为同样的国际环境对于有不同目标的国家来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冲突、紧张的周边环境，对于要谋求和平发展的国家来说是挑战，但对于要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的国家来说则可能是机遇。因此，评估中国的机遇期，就要评估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目标，而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又取决于中国的身份定位。对于决策者来说，对身份有不同的认知，就会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因此对国际环境有不同的判断。

中国的双重身份

中国的身份定位是什么,这本来是没有疑问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一点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中国正日益被国际社会视为“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在中国国内,人们的大国意识也在不断上升。这是国家强大之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人们对国家身份的认知是决定国家利益需求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评估中国的机遇期就要分析这两种身份的影响。

提出双重身份问题的根据是两个基本事实。

一是人们的认知。2011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以“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居首位的超级大国”(world's leading superpower)为题,在22个国家进行了民调。有8个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中国,超过半数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其他14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持肯定意见者多于持否定意见者。^[1]这样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超级大国”身份可能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舆论(包括中国舆论)所认定。

二是中国的现实。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发展程度却仍居世界中游。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排名,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分别居世界第87位和91位,相当于美国的11%和12%。^[2]按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3)的排名,2012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列第101位,也属于中游水平。^[3]这些统计排名表明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

上述的两个事实,说明中国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既具有发展中国家身份,又具有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身份。这两种身份决定中国有两种相应的利益需求,并且会受到两种互相矛盾的行动逻辑的影响。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根本利益在于谋发展。实现这样的利益,中国就需要始终把力量和资源集中于国内的建设。在对外关系上要把可能导致冲突的因素

[1] Pew Research Center, "U.S. Status as World's Superpower Challenged by Rise of China, U.S. Favorability Ratings Remain Positive", July 13, 2011, <http://pewresearch.org/pubs/2059/-superpower-china-us-image-abroad-afghanistan-terrorism>.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见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13,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3/02/weodata/index.aspx>。世界银行数据,见 <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home.aspx>。2013年12月引用。

[3] 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13),见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2013>。

限制在低水平上，以确保能有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

相反，作为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中国则需要基于增长的权力来界定自己的利益。中国地位与影响上升，就会有开展大国外交的需求；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就会有发展相应军力的需求；有了日益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就会有冲破海上遏制，实现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需求。要实现这些利益，中国就需要在基于实力的互动中谋求有利的地位，进行大国权力竞争，包括军力的竞争。

对比这两种利益需求所导致的行动逻辑，可以看到，其中最突出的差异是体现在军力的建设与使用上。以发展为中心，进行军力建设是以确保发展为目标，对国防的资源投入是防御性的和有限的，在总体上是一种内向模式；而应对权力竞争，发展军力则会卷入一定程度的军备竞赛，即伴随中国权力的增强，外部的遏制力量也会相应增大，而中国则不得不进一步增强军力以应对这种压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军力的运用也会体现出某种外向的特点。

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事实上已进入了两种机制同时起作用的阶段。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国国力增强引发了一种结构性变化。说得确切些，发展导致中国权力（特别是硬权力）的增大，而权力的增大则导致中国身份的变化和战略利益中与权力相关的需求的增大。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战略重心也在发生变化。原本支配中国战略选择的是发展的逻辑，现在随着权力因素的影响的上升，正逐渐形成两种机制同时起作用的局面。

在两种机制的影响下，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全力集中于国内建设了。由于中国在自身实力增长后有了日益增大的与权力政治相关的利益，而外部世界在把中国定位于大国甚至超级大国后，与中国的互动更多地具有了权力政治和大国竞争的内涵，因此中国会面对着冲突因素上升的国际关系前景。由于权力政治是一个“行动—反行动”的过程，即每一方的行动都会导致另一方采取反行动，因此不论中国的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得不按照这种游戏规则一步步地做出反应。这样一个演进过程有两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一是权力竞争的升级会迫使中国进一步增强权力手段以应对增多的冲突，而这样的互动有可能使中国失去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二是中国的战略重心会发生转变，即国家会为应对权力竞争而投入日益增多的资源与力量，而这会使经济建设和满足国内需求失去首要地位。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显然面对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因为这两种影响机制是不相容的，中国不可能有两个战略重心。要确定哪一种前景对中国来说是适宜的，从战略判断来讲，就需要首先明确中国真实的身份与利益，然后才能确定

中国应当实行怎样的对外政策。

对“超级大国”的向往与现实

对于一直以发展中国家为身份的中国来说，基于双重身份进行战略选择，实际上面对的是如何看待未来做一个“超级大国”前景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有怎样的利益需求，看一下2013年12月发布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撰写的《中美安全关注调查》（*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该调查是针对中美两国进行的，下面引用的只是对于中国调查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中国不同人群对中国身份的某种程度的认知倾向。

问题1 中国应在世界上发挥怎样的作用？（%）

	做唯一的 世界领导者	（与美国）共同 发挥领导作用	根本不要 发挥领导作用	不知道/拒绝回答
普通公众	14	45	19	22
政府精英	3	69	21	7
军队（学者）	1	84	12	3
工商企业	7	70	14	8
学者	3	86	12	0
新闻媒体	11	63	14	12

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2013, p.24.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s_china_security_perceptions_report.pdf.

问题2 世界怎样才能更稳定？（%）

	美国依然是居主导 地位的超级大国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居主导 地位的超级大国	中美权力平衡	不知道/拒绝回答
政府精英	8	12	76	4
军队学者	22	3	66	10
工商企业	20	10	67	2

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 *US-China Security Perceptions Survey*, 2013, p.2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us_china_security_perceptions_report.pdf.

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政府、军队和学者中的多数人认为中国应与美国共同领导世界，这与认为中美权力平衡会使世界更稳定的看法是一致的。尽管主张中国做世界唯一领导者以及取代美国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人数很少，但主张与美国分享权力或实现权力平衡，实际上仍然意味着要中国做超级大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做世界唯一领导者的问题，中国政府、军队和学者都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可能与中国长期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观是有关系的。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公众与媒体相对而言有更多的人持肯定意见（分别占14%和11%）。从总体的民意来看，中国对大国乃至超级大国的向往，可能已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基础。

在人均发展程度还不高的阶段出现对超级大国的利益追求，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互动中是以一个整体行事，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整体力量确实增强了，已经可以做一些大国才能做的事情了。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肯定已成为了经济大国，在贸易、金融等领域，中国的地位已举足轻重。以经济总量为支撑，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以经济地位与军事地位为基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显著增强，开始了大国外交的新追求。再加上中国原本就具有的一些大国因素，诸如国土和人口规模、悠久的文明影响、航天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武器国家地位等，总体来看，中国已在一些重要方面具有了大国的形象与影响力。

然而，人均发展程度决定中国并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有评论认为，如果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将是一个“奇特的超级大国”，因为最大经济体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既富有又贫穷。^[1]显然，以人均发展水平衡量，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当然，现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具有某些“超级大国”特色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身份具有超级大国特色，从战略上讲，就具有了向超级大国发展的选项。实际上，多数把中国同超级大国的身份相联系的人并不认为中国现在已成为超级大国，而是认为中国在不远的未来会成为超级大国。中国未来有没有这种发展的可能？思考中国的机遇期，这个问题显然需要进行讨论。

按照中国一直坚持的国策，中国是不做超级大国的。除了“不称霸”这一道义理由外，从理论上讲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决定中国不可能走超级大国之路。

第一是发展程度。中国现有的发展程度，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是需要经过

[1] Gideon Rachman, "When China Becomes Number One", *Financial Times*, June 6, 2011.

漫长的努力的。中国的人口基数更增加了这种发展的难度。在低起点的阶段，中国的发展相对容易，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向前走就会越来越困难。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会越来越突出。按照传统的标准，做超级大国不但要有超强的硬权力（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体现），而且要有别国不能相比的软权力（以文化、价值观以及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力为体现）。超级大国是需要有能力维护世界秩序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就中国而言，现在只是具有了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其他方面都差得远。遵循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中国根本不可能把力量用于实现这些目标。虽然中国现在的对外政策行为有了某些大国特点，但中国发展军事力量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主导国际秩序和确立国际规范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软权力影响，特别是让国际社会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有能力去做超级大国。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传统的超级大国乃是权力竞争的产物。在21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权力政治一直是国际互动的主题。权力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霸权与均势这两种体系交替出现。在权力竞争中，权力最大的国家就会成为超级大国，而超级大国则一直扮演着支配国际秩序的角色。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国际关系中却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变化，即随着世界大战危险的消除和全球问题的凸显，全球治理成为了与权力政治并列的国际结构。全球治理导致了权力的扩散化和中小国家地位的上升。在全球治理中，大国虽然能够发挥更大作用，但大国并不能发挥在权力政治中的那种决定性影响。因此，虽然大国间仍然存在权力竞争，但权力政治已不是唯一的主题。伴随着全球治理进程的推进，超级大国在国际互动中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仍然可能搞具有霸权主义意义的单边行动，但更多的时候需要依靠多边外交与国际机制。由于当今的世界大国都是核武器国家，大国之间发生全面战争已不可想象，因此超级的权力在很多时候已不再能发挥超级的影响力了。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演进中，极化政治的影响开始淡化，未来格局的一种可能是没有大国愿意并能够做世界领导者。从这种走势讲，“超级大国”的身份有可能逐渐失去传统的国际政治意义。

基于以上理由，中国适宜的身份与利益的选择，应是继续做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去做“超级大国”。未来的中国即使真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不能把过多的力量用于军力发展和世界性的权力竞争。中国实行大国外交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只能是适度的和有限的。这些选择都是由中国的人均发展程度决定的。

特别是在军力建设的问题上，除非是国家面临战争威胁，否则中国决不应该改变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战略布局。

挑战与应对

对中国来说，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需要谋求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由于双重身份改变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关系，使得中国不得不面对着冲突因素上升的可能局面，因此中国要谋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与外部世界的权力互动问题。由于这种权力政治局面不能消除，只能改善，因此可行的做法就是尽可能减少其不利的影响。

中国所面对的权力政治挑战，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已被视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而崛起的大国通常被认为是要改变现状。尤其是现有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对于这一点极为敏感。虽然中国并没有挑战现状的意图，也没有做出挑战现状的举动，但仍然受到了外部权力的日益增大的遏制性压力。二是中国尚未实现国家统一，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涉及权力互动关系。中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利益，就必然会与相关国家形成矛盾与冲突的关系。中国主权利益受侵害的情况加剧，中国维护主权的力度加大，这种冲突就会升级。三是伴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国的海洋利益会进一步扩展，而中国海上军事活动的范围也会扩展。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别国猜忌。

从中国自身的意愿来说，为确保和平的发展环境，是希望权力政治竞争的消极影响最小化的，例如强调自己的发展利益和防御宗旨，把领土争端限制在双边范围，但凸显的“大国”身份却使得外部世界更倾向于把中国的这些行为解读为外向的扩张。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宣称加强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同盟，频繁举行各种联合演习，开展对中国周边小国的外交，干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台湾问题，都体现了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这些行动导致一种具有遏制中国意义的地区权力结构。对于这些遏制行动，中国不可能不做出反应，否则国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但进行这样的互动，就难免要卷入权力竞争的“安全困境”，从而会导致一种不断加剧的竞争和不信任的循环。对于中国来说，卷入这种权力政治的程度越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所受干扰就越大。

就中国在这个层面的互动而言，军力建设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中国坚持内

向与防御型的国防战略，同样需要谋求军力的相应发展，否则国家安全就没有保证。由于中国实力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地区甚至世界的权力结构，因此出现某种程度的紧张是必然的。由于这种紧张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心态，因此中国要消除与外部世界在军事互动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关键不在于发展或不发展某种军事装备，而在于能否与相关国家建立起互信关系，使它们理解中国实力发展的适度性与防御性，从而使得军事互动能够保持在相互不感到威胁的框架之内。

以权力手段维护国家利益，捍卫领土主权是最基本的自卫模式。中国面对的领土争端，鉴于自身的实力，如果是在双边的范围，是可以把问题局限于外交层面的。然而，如果争端的另一方使问题国际化，引入外部势力对中国进行牵制，那么这种互动就会在更大程度上映射到地区权力的层面。一旦中国与相关国家的领土争端演变成地区权力层面的紧张关系，就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发展环境。所以，中国处理领土问题，特别需要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避免使争端演变成地区层面的权力竞争结构。中国解决领土争端的关键，是在捍卫主权和维护周边和平环境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在此问题上，中国运用权力手段必须与外交谈判和制度性手段相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影响。说得确切些，中国使用权力手段，主旨不是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通过威慑把问题控制在能够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程度之内，为双边外交谈判创造条件。以促和为目的发展和使用权力手段，这与中国有限度地发展军事力量的目标是相符的，与中国内向地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是相符的，与中国谋求和平的发展环境的根本要求也是相符的。

中国目前所面对的权力政治困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的“超级大国”身份相关的。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焦点就是中国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迅速发展所体现的权力的增长。世界各国公众对这样的发展所形成的舆论和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会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

在有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军力增长的问题上，皮尤的调查揭示了非常消极的舆论倾向。在2011年所调查的21个国家中，对中国军力增长持否定意见者占多数的国家有17个。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尽管有13个国家持肯定意见者超过持否定意见者，但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都是持否定意见者居多。对于中国在军事上像美国一样强大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在被调查的22个国家中，有15个国家认为是坏事者居多，其中13个国家过半数。欧洲国家的被访问者多数都认为是坏事。在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认为是坏事的受访者比例都逾80%。

皮尤中心的数据，不管准确度如何，都是值得注意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军

力发展的消极舆论，无疑构成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土壤。在这些问题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舆论倾向。在中国只有中等发展程度的情况下就认为可以取美国而代之，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应该像美国一样强大，这种心态无疑会对中国的战略选择和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战略选择产生消极影响。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只能遵循发展的逻辑而不是权力竞争的逻辑，因此中国自身的大国心态和国际舆论所塑造的中国的“大国”形象与中国要走和能走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相符的。这种观念环境的存在与蔓延，是有害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进行公共外交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要消除公众的误解，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可以考虑作为舆论工作的要点。

第一，不论中国经济总量取得怎样的成就，中国人均发展在世界上只有中游水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国情，决定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发展的进程，面对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要实现惠及全中国人民的高水平发展是一件需要长期努力的事情，因此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发展方针。中国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利益，就必须把战略的中心和重心始终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而不可能把资源用于对外谋求霸权。

第二，以发展为中心，决定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根本目标是确保和平的发展环境。这样的环境应当是一种以双边和多边合作为架构的秩序。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建立以自己为霸权国的体系，也不接受别国建立的霸权体系。中国也不愿意通过军备竞赛谋求权力政治意义上的均势。最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模式是在国际制度基础上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谋求共赢。对于中国来说，对外关系无序，就无法安心地进行经济建设。为了确保有序的和平环境，中国需要把和平手段作为解决领土争端和国家统一问题的首选途径。

第三，中国谋求以和平手段解决对外关系中的争端，不单决定于中国的身份与国家利益，而且决定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在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中，古代中国的政治家是倾向于和；在不得不战的时候，采取的是以战促和；在实现了和以后，则特别强调“恩”与“德”的教育和影响作用。这样的模式所体现的“和合文化”传统，在当代仍然有重要影响。195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共处的思想，60年代周恩来阐述基于民族传统的中国外交哲学，都体现了这样的战略理念。^[1]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328页。

第四，以发展利益为中心，不以争霸为目标，决定中国军力的发展具有防御性，是内向的。中国进行军力建设的宗旨是为国家发展服务。这一宗旨决定中国军力的发展是有限的，即以能够胜任防御任务为限度。中国GDP即使未来超过美国，也不会军在备上谋求达到美国的水平，因为中国的人均幸福程度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重心。虽然为了自卫的需要，中国的军力会随世界军备发展潮流发展，包括更新旧装备并发展一些先进武器，但不会也不可能卷入军备竞赛。对于中国来讲，一旦军备建设超出自卫的限度，就会对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不但在国内会占用过多不必要的资源，而且在对外互动中也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关系。

第五，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全球经济互动关系的发展。中国固然会消耗更多的资源，但同样会生产出更多各国需要的商品。中国的商品固然要对外出口，但中国亦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也需要进口各国商品。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分量，已成为了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推动力。由于中国会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并且不会把经济发展成果同步地转变为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其他国家的利益的。

第六，随着地位与影响的提升，中国已被推到全球治理舞台的中央。在以国际制度为框架的合作中，中国基于自己的分量，会承担起不断增大的责任，其中包括维护世界和平，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稳定世界经济，推动全球治理议程等。

以上这些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崛起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成为威胁别国的“老大”。由于现在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的舆论已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准备做“老大”，越来越倾向于像“老大”那样行事，认为中国在外交与军事上都应该更加强硬，因此要改变别国公众的观念，首先需要改变本国公众的观念，要让别国淡化视中国为超级大国的心态，首先自己要淡化大国心态。尽管这样的改变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但要真正消除“中国威胁论”，消除带有猜忌甚至敌意的国际舆论环境，就必须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沟通 and 说服工作。进行这样的工作，当然不能仅靠公共外交，但公共外交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与影响。

总之，在参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中国只有适宜地处理好双重身份带来的困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避免大国政治竞争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把握未来的发展机遇，顺利地实现自己的总体战略目标。■